

# 文艺创作要树立正确历史观

张江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生态文学创作也迎来崭新面貌。越来越多的作家致力其中,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这一题材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性也获得提升

生态文学写作一直是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大地上的事情》《狼图腾》等曾在不同时期引发广泛社会关注的作品中,我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作家对祖国生态环境建设的关注。近年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深入人心,生态文明建设稳步推进,各地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人们的生态意识不断增强,生态文学创作也迎来崭新面貌。越来越多作家致力于这一题材创作,以文学笔触对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进行艺术化再现,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较以往有所突破,这一题材在文学版图中的重要性也获得提升。去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就有散文《流水似的走马》《遥远的向日葵地》、报告文学《大森林》、中篇小说《蘑菇圈》等多部生态题材作品。

从作品思想内涵来看,早期生态题材文学作品主题较为单一,创作者往往用直接呼吁的方式指出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破坏将给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带来严重后果,以此唤醒生态环境意识。故事发展脉络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保护和破坏生态环境双方的对立为故事主线,通过生态灾难结局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二是通过讴歌原始状态生态环境和生活方式,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危害。

在近年涌现的优秀生态题材文学作品中,作家更多地把生态保护话题放置于更广阔的社会现实和历史纵深的坐标系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不断深化,作品思辨色彩更加强烈,主题哲理性明显加强,折射出的作家写作姿态更加理性。如阿来中篇小说《三只虫草》,没有单纯渲染挖掘虫草的行为对草原植被的破坏,而是更加强调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是孤立的,应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等民生举措紧密联系起来。李青松长篇散文《塞罕坝时间》,不是单纯歌颂塞罕坝林业人的奋斗历程和献身精神,而是把塞罕坝由贫瘠荒凉的沙地变为现代化林场的发展过程,放到当地乃至整个北方自然环境历史变迁中来看,进一步凸显塞罕坝植树造林事业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

在文学表现力方面,生态文学创作也获得进展:生态文学作品正通过跨学科的知识谱系、多样化的社会视角、个性化的意境营造,带给读者更加丰富新鲜的阅读体验。此前生态文学作家的笔墨往往倾注于两个方面:对原始森林、草原等自然环境的奇观化赞美,对栖居于原始自然环境中人们生活的传奇式讲述,进而与当代现实生活形成对比。简单地讲,即通过渲染某种陌生化经验吸引读者,激发读者对破坏自然生态行为的反思,以及对原始自然环境的向往。

在近年来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中,作家荡开笔墨,用多样化笔触、丰富立体的情感,书写良性生态环境带给人们生活品质和精神面貌上的变化。这些作品整体上呈现出多元开阔的艺术风貌和丰富细腻的审美层次,从不同视角清晰还原生态环境获得改善、科学生态观念建立的过程。如艾平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从一位老牧民寻访数十年前失散亲人的经历出发,通过老牧民在不同牧区的现场感受,令人信服地呈现当前经济政策在保护草原生态、提高牧民生活水平方面的积极作用。鲍尔吉·原野散文《流水似的走马》、李娟散文《遥远的向日葵地》,语言生动幽默、生态场景描写细腻扎实、整体格调明朗清新,散发出草原清晨般的氛围。梁衡散文《树梢上的中国》、蒋蓝散文《豹典》、徐刚报告文学《大森林》等作品,串连整合生物学、生态学、地质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知识,思考深入,笔调坚实厚重,带给读者沉稳绵密、回味无穷的感受。

当前生态文学创作整体上呈现良好发展态势,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有的作家在进入生态文学创作领域时,并未建立起完备知识储备,对生态环境变化和生态保护工作实际也缺乏深入细致把握,因而或出现科学谬误,或从影视作品、新闻报道中借用二手信息,因假想、模仿代替踏访、调查,把生态环境复杂的改善过程和生态保护实践的艰巨努力简化为若干个波澜起伏的戏剧冲突,出现作品编织痕迹较明显、内在肌理虚弱、现场感不强等问题,非但没有通过文学创作引发人们对现实的关注和思考,反而简化弱化人们对生态保护实践的认知。

任何一种文学类型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生态文学也是如此,它在思想性、艺术性方面取得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态观念的变化息息相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实践和丰富成果,为生态文学繁荣发展提供取之不竭的创作资源。生态文学的生命力就在于把我国生态环境发展更立体、更全面、更深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和视野,把人类生存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深层关联更清晰地呈现出来,在读者心中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生态观念,为人们勾勒出更美好的未来图景,从而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充足的精神动力,形成生态文学创作与生态文明建设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小历史写好了也可以成就大作品,从文学艺术本质特征来讲,其具象化表现方式也与个人的、日常的、喜怒哀乐的小历史颇为契合。

不过,小历史要写出历史大气象,是对创作者功力的考验。当前一些历史题材作品缺少的恰恰是这一点。本来是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是彪炳史册的英雄人物,在一些艺术家手中呈现出来的反而只是琐屑庸常一面。英雄固然也是人,也有儿女情长,也需要柴米油盐,但是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绝不仅仅因为这些,而是因为他们身上具有超出常人的特殊品质和力量。这种品质和力量对应的不仅是个个人,更是整个时代、整个国家和民族。纵观文艺发展史,大凡经典历史题材作品无不如此。一切历史,包括一个人的历史、一个家庭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都可以成为文艺创作素材,一旦被作为一部伟大历史题材作品的构成要素,作家艺术家就需要赋予它超越自身折射时代、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换言之,小历史只有放在大历史格局中,人物、故事、细节才会有大气象。

事实上,小历史与大历史不是绝对的,只是观照视角和焦点不同。小历史聚合在一起就是大历史,小历史中蕴含大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大历史总是裹挟小历史前进,没有孤悬于大历史之外的小历史。所谓小历史也要写出大气象,指的就是作家艺术家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不能将历史矮化、孤立化,要有胸怀天下的格局、目及古今的视野,只有这样,历史在其手中才会被赋予厚重感,拿出的作品才会具备应有高度。

作家艺术家不一定都要成为史学家,但多读一点历史是必要的。对历史一无所知,或者历史知识支离破碎,正确历史观就无从树立。只有真正走进历史深处,了解历史的宏大和壮阔,才会从心底升起对历史的尊重和敬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制图:张丹峰



历史题材创作要求创作者校准价值观,葆有历史正义,该抨击的抨击,该讴歌的讴歌,该同情的同情

面对历史时,创作者的虚构和想象必须遵循历史法度的规约。这一法度就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创作者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必须在这二者之间寻找到恰切平衡点

小历史也要写出大气象,作家艺术家不能人为地将历史矮化、孤立化,要有胸怀天下的格局、目及古今的视野,只有这样,历史才有厚重感,作品也才有高度

史,毋宁说它借某一段历史传递某一种历史观和价值观。我们一直倡导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具体到历史题材创作,这一要求或许可以换成更具针对性的表达:创作者要校准价值观,葆有历史正义,该抨击的抨击,该讴歌的讴歌,该同情的同情。

## 历史法度与虚构尺度

有一段时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文化消费主义思潮彼此策应,相互助长,对文艺创作产生影响。具体来说,历史虚无主义从理念上消解历史真实的规约,为文化消费主义提供理论支撑;同时,文化消费主义以“消费”“娱乐”为目的,为历史虚无主义制造市场需求。比如,在个别影视剧,历史演进被转换为宫闱秘史、粉黛争宠、权谋算计,英雄人物被随意涂抹,让人感到荒唐和愤慨。

文艺创作可以虚构,这是创作基本常识,历史上位列经典的众多历史题材文艺作品也都大量使用虚构和想象。没有虚构和想象,《三国演义》很难成为《三国演义》,《水浒传》也很难成为《水浒传》。在承认虚构合法性同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艺术家的虚构是无限制、无约束的吗?当然不是。在面对历史时,创作者的虚构和想象必须遵循历史法度的规约。这一法度就是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

说到底,创作者在进行历史题材创作时,必须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寻找到恰切平衡点。历史真实要求创作者尊重

历史、敬畏历史,不能完全抛开历史信马由缰、随心所欲;艺术真实又赋予创作者一定虚构和想象的自由,两者彼此制约、相互养成。背离历史本质真实,历史题材创作就成为假借历史之名的冒牌货;没有艺术真实,历史题材创作就失去艺术魅力,沦为扁平的历史流水账。有经验的艺术家经常用“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作为历史题材创作基本原则,这或许是寻找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平衡点简单易行的办法。

历史题材创作的题中之义,是用艺术的方式帮助受众拨开弥漫在历史表层的迷雾,传达历史精神,让人们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凭借花花绿绿的趣事逸闻满足好奇之欲,或者过度依靠虚构和想象,建构没有历史骨架的虚空历史,都有悖于作家艺术家应有的远大抱负。历史题材创作中,“历史”变得越来越“好看”、越来越“有趣”,但厚重历史感及其带给人们的思考却越来越少,这样的历史题材创作难以行远,值得深思。

## 历史厚度与作品高度

近年来,有历史学家提出“小历史”与“大历史”概念。以我的理解,所谓小历史就是那些“局部的”历史,比如个人的历史,日常、生活层面的历史等。所谓大历史,是“全局性”的历史,比如时代更迭的历史、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等。那么,在历史题材文艺创作中,艺术家应该写小历史还是大历史?这样提问,绝不是重拾题材决定论。大历史写不好同样是小作品,

# 塑造乡村少年新形象

——读《陈土豆的红灯笼》

王必胜

爱心奉献。首先是与邻居间的友爱。小说中的三楞爷、张豆腐们,虽无不狡黠和自私,但古道热肠,和善友好,土豆是他们心中的好孩子,用三楞爷的话说,陈土豆是“一根筋”,但“是一个好人”。陈土豆留守乡里,生病了,三楞爷找来医生,张豆腐女儿春妮为他打针,他也回报乡邻,为学龄前的孩子们讲课,为大人们做好事。其次,是对父母的爱,爱父母也期盼父母亲爱他和妹妹。他几次劝说父母和好,守住一个完整的家。再次,他喜爱毛驴,善待动物。当三楞爷、张豆腐们虐待遗弃甚至要打杀毛驴时,他借以家中承包地换回毛驴性命。毛驴被打,他用身子护卫;毛驴丢失,他执著寻找。他以儿童心性善待毛驴,给它取名字,同它说话,牵它上街赶集,让它撒欢、过瘾,看着它“偷着乐”。爱心、善心,支撑着乡村少年陈土豆对生活、对家人亲友、对世间一切葆有坚韧乐观的态度和

热情友善的情怀。小说结尾,一年一度的年关喜庆,陈土豆将生病的父母接回家,并在院子里高高挂起早已计划的大红灯笼。“红灯笼”照耀家中点亮生活;寻常日子,平凡人家,期待的就是红红火火、团团圆圆,这只灯笼寄托着一个乡村少年的念想。

担当和勤劳,是陈土豆形象另一面。冬天,他套着驴车打柴火,冒着严寒帮助张豆腐修理树枝。对少年玩伴,他友善侠义,与妹妹陈小鱼的亲热逗乐,与同学张春妮的互助、欣赏,面对困难和烦忧有疑惑,也奋发努力。陈土豆爱憎分明,不屑于张豆腐对毛驴的占有,也不惯三楞爷的粗暴。面对上门的讨债人,他劝父亲积极面对,“不能让人背后戳脊梁骨”,欠的账,“你还不了,我以后也要还清”。春妮说他也像毛驴一样的性格,坚韧、朴实、奉献,为他人着想。这些成长中的好性格、正能量展示了当代乡村少年形象的光彩。



《陈土豆的红灯笼》谢欢著,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文艺创作离不开历史。纵观文艺发展史,历史题材是文艺创作重要生长极,历史题材创作长盛不衰,诞生诸多名家名作。从更宽泛意义上讲,任何文艺创作都是一定历史语境之下的行为,“历史”之于创作者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就此而言,树立正确历史观不仅是历史题材创作者必修课,更是每一名文艺创作者都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 历史刻度与文艺温度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奔腾的历史长河展现的往往是绵延、线性、理性的一面。尤其是经过时间过滤,历史往往只留下文字的中性概括。但事实上,历史不是抽象符号,具体到某一刻度内,历史总是斑斓而丰富的,有歌哭、有欢笑、有挣扎、有雀跃,有兴衰成败也有聚散离合。这才是历史本来面目。一个个鲜活个体的集构成历史有机体的万千细胞。除个体的喜怒哀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更是往事沧桑。战争、生存、发展、屈辱、荣耀……凡此种种,铸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定历史时段内的主题和底色。历史的主题、底色与国家民族命运关联在一起,也与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个体关联在一起。

文艺的温度,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对个体、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观照之中。在切入历史时,文艺创作过程其实就是重新赋予历史以情感温度的过程。创作者对待历史的态度,决定作品情感温度。近些年一些作品在这方面处理不当。比如,出于商业目的考量,本来面对的是一段沉重严肃的民族抗争史,但是个别创作者在面对这段历史时,展现的却是嬉戏娱乐的态度,暴露其对历史的无知和轻慢。

文艺家触摸一段历史,就是去感知和呈现生命的温度,民胞物与精神是创作者穿行于历史时应具备的。以《黄河大合唱》为例,它对中国人民坚强不屈斗争精神的热情讴歌,以及所发出“团结一心冲上前”的怒吼,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投身可歌可泣的抗斗争!正是因为创作者对民族历史命运深刻关切,《黄河大合唱》至今仍然能够唤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情感。这就是有温度的文艺,文艺也因此才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

进一步说,创作者在历史面前展现的同情或冷漠、赞许或批判、讴歌或嘲讽,无一不是创作者价值观的传达。就历史题材文艺创作而言,与其说它还原了某一段历

在方兴未艾的乡村振兴中,对正在脱贫致富路上奋斗前行的人们,特别是少年儿童生活,文学家们需要有更多关注

作为当代文学重要一翼的儿童文学,其影响力虽有向上之势,但也有亟待加强之处,比如限于成人化视角、手法雷同单调、人物形象弱化。读新人物新形象的作品,眼前一亮。比如谢华良撰写的《陈土豆的红灯笼》,描写当下乡村留守少年生活,弘扬正能量,塑造生动人物,充满童真与童趣。

十五岁的陈土豆,父母到城里打工,他上学之余照顾七岁妹妹。春去秋来,日复一日,他挑起生活重担,上学读书,乐于助人,友善乡邻,为教妹妹而吸引更多村里孩子,在村头树下办起“转圈的教室”。他与邻居因为一头毛驴的养护,几番易主、几番争执,表现出他诚实善良的品格。小说故事生动,情节集中,人物不多,描绘了陈土豆的热心善良、勤劳好学、追求上进的性格,塑造踏实、担当、可亲的乡村少年形象。

陈土豆形象最为突出的是善良有爱心,热情助人。无论是对待家人还是乡亲邻居,哪怕是村里一头毛驴。乡村生活的磨砺,传统文明的熏陶,陈土豆与人为善,